



明清时期西方传教士 中国儒道释典籍之 翻译与诠释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Confucian,
Daoist and Buddhist Canons by Western Missionaries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李新德 著



商務印書館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明清时期西方传教士 中国儒道释典籍之翻译与诠释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Confucian,
Daoist and Buddhist Canons by Western Missionaries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李新德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5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清时期西方传教士中国儒道释典籍之翻译与诠释 / 李新德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ISBN 978-7-100-11841-5

I. ①明… II. ①李… III. ①儒家—古籍—翻译—研究—中国—明清时代②道家—古籍—翻译—研究—中国—明清时代③佛教—古籍—翻译—研究—中国—明清时代
IV. ①B220.5 ②B948 ③H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96393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明清时期西方传教士
中国儒道释典籍之翻译与诠释
李新德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1841-5

2015年12月第1版

开本 705×1000 1/16

2015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张 33½ 字数 598千字

定价: 80.00元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关于从容探索的学术心境

——代序

杨乃乔

在《明清时期西方传教士中国儒道释典籍之翻译与诠释》出版之际，李新德博士叮嘱我要为他这部专著写一《序言》。严格地讲，他已经是这个研究方向下的青年专家了，其实我在这里不必再说多余的话。我只是想围绕着新德博士的这部专著简约谈两点感受：一是关于博士后科研工作研究方法论问题，二是第一手源语文献的积累与使用的问题。

2008年6月至2010年12月，新德博士曾在复旦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方向下做博士后科研工作，他的出站报告为《“他者”形象与翻译策略：对明清时期西方传教士中国儒道释典籍之翻译与诠释的研究》。至今，他的这份出站报告电子版依然存放在我的电脑硬盘中。我用电脑通检了一下，整部出站报告有332604字，共416页。客观地讲，在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方向下，这是一部涉及中西多种语言文献、研究文献积累、学术立场明确且有着作者自己深度思考的优秀博士后论文。在出站答辩时，这篇论文及其答辩回应受到了10位在场评审专家的一致好评。

多年来，从我个人积累的关于博士后科研工作人员培养的经验来看，我特别建议博士后进站后，其择取的选题还是应该接续博士论文的研究方向思考下去，最好不要另起炉灶重新选题，避免让自己跌入一个全新且陌生的学术领域重新起跑，因为重新转换一个研究选题，在学术视域上必然要求研究者在短期内重新积累一套知识结构。说到底，这谈何容易。

因为学术研究在知识积累上有着长期性与持久性，而博士后进站的科研工作时间也只有短短两年（少数博士后可以延期至三年），除去进站后的开题与出站前的答辩及办理相关体制性手续等，一位博士后的有效在站科研时间其实只有一年半左右。在如此紧迫的时间内，要撰写出一部学养积

累厚重并有思想深度的博士后论文来,的确不是件容易的事。事实证明,凡在选题上另起炉灶的博士后几乎都是在仓促应付中草草收场,最终无法拿出让自己与合作导师同时满意的出站报告;而在博士论文的选题上给予接续性、补充性与重构性思考的博士后论文,往往可能完成得比较从容,把博士论文的选题及其研究提升到更高的学术层面加以重构,因此在学术思想构成上必然更为厚重。

我们应该承认,从容是学术研究得以沉稳、通畅展开的基质,其背后不仅是学者个人对高校的行政头衔及繁琐的体制性学术活动所表现出的淡漠,更在于学者个人正是在这种淡漠中让自己获取一种安静的学术心境去延展自己的学术书写。这是一种低调的进取,不是每位学者都可以拥有的,而新德博士做到了这一点。

我想说的是,从博士到博士后,再到博士后出站以来的几年中,新德博士始终坚守在明清时期西方传教士对中国儒道释典籍的翻译与诠释这个课题上,反复思考了十多年,对最初进入这一课题的早期研究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特别是在复旦大学中文系做博士后的两年多时间及到现下,他的科研状态一直稳健、从容、扎实,未见半点浮躁。

我特别注意到,此次出版的专著,较之于出站时所提交的博士后论文,新德博士又增益了10万字内容。他的博士后科研工作在规定的时间结束了,然而他的学术探究依然在延续,已整整坚守了7年。这部专著现下的思想体系,可喜地呈现了新德博士的拓展性深度思考。可以说,新德博士已把他做博士后科研工作所持有的学术心境内化为一种做人的品格。我始终认为,一位学者一生出版多部或十几部不痛不痒的平庸读本,绝不如出版一部厚重的优秀专著。平心而论,人一生的精力与时间都是有限的,一位学者一生能够写出一部厚重、优秀的专著,足矣!

以下我想谈一谈新德博士在做博士后科研工作期间给我留下的另外一个深刻的印象,即他对第一手源语文献积累与使用的苛求性。

这个选题研究的知识结构与学术信息量颇具广度和深度,同行学者一眼即可见出,其至少涉及了五种相关研究领域:比较文学研究、明清传教士研究、翻译研究、汉语本土的儒道释经典研究与西方汉学研究。我特别想提及的是,新德博士在这部专著中,把上述五个研究领域交集在一个空间予以整合性思考,尤其是在比较文学研究的学科意识上表现出一种学科理论的自觉。

这部专著把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两个重要概念“自我”与“他者”提取出来,将其设置为作者展开研究的比较视域,以透向西方传教士对中国儒道释

经典的翻译活动及其翻译策略。

我们知道,自法国学派在国际比较文学研究界崛起以来,作为“他者”形象记录的游记文学即成为国际比较文学研究者所关注的普遍文本现象。新德博士的这本专著把法国形象学研究的理论及其学科意识作为一枚有效的学术透镜,细致、全面地考察了在书写文体上与之有所交集的文本现象,其中包括中西交通史中的游记,当然还包括耶稣会士、晚清新教传教士书写的汉语基督教文本与著述以及他们汉译的西方经典文本、西译的中国儒道释等宗教文化经典文本。在这部专著中,作者对异国形象的研究基于上述不同时期多种语言的游记文学,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文本分析范例。

这部厚重的学术专著是从博士后论文撰写所要求的方法论中延续而来的,字里行间显露出学院派写作的踪迹。作者尽可能使用第一手源语文献,回避使用或尽量少用译入语文献,以避免源语文献向译入语文献转码时所带来的误读与过度诠释。苛求第一手源语文献的意义真值性,可以说是这部专著在立论与写作过程中所坚守的立场。

我想专业读者在翻阅这部专著时不难发现,作者就如此密集的文献使用又有着自己的讲求。他依凭学界及自己手中现有文献多寡的客观情况,对于早期西方学人记述中国或中国题材的游记资料,尽可能地给予穷尽性阅读;而面对明清时期大量传教士的著述文本以及晚清新教传教士的汉学著述,作者则给出甄别性的选择,以便让自己所阅读与引用的文献更加准确化、精致化。在中国儒道释典籍西译的文本分析方面,作者尽可能选择国际学界未曾评论过且具有代表性的读本,如耶稣会士所译的《四书》、新教传教士马士曼的《论语》、马礼逊的《大学》、理雅各的《诗经》《道德经》与苏慧廉的《论语》《妙法莲华经》等。因此,在同一领域的研究课题下,作者不仅可以接续拓出一方扩展性的阅读与研究空间,而且可以避免把自己捆绑在那些众所周知、陈陈相因的文献中进行重复性的思考与写作。

十多年来,新德博士从事比较文学研究与传教士汉学研究,在学院派的方法论上培养了严谨的学术品质。在第一手源语文献的获取上,可以说,他是不辞劳苦的。多年来,尤其是在做博士后期间,他奔走于美国、英国、中国香港以及北京、上海等地多所大学、专业图书馆与研究机构,收集大量第一手源语文献,让自己在研究思路中获得崭新的突破。例如,比利时耶稣会士卫方济于1711年出版的《中国六大经典》(*Sinensis Imperii Libri Classici Sex*)拉丁文译本,海外学者阿道夫·赖希魏因、谭卓垣误将卫方济在其中所译的《小学》认为是《三字经》,而国内学者因缺少第一手资料又未加考辨,结果直接承袭了谭卓垣等人的错误看法,以讹传讹。新德博士则通过对拉丁

文原文以及法文译本的考辨,确认卫方济的《中国六大经典》译本是以比利时耶稣会士柏应理等编撰的《中国哲学家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为基础,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孝经》与《小学》译成拉丁文。在全球化时代,比较文学研究也进一步推动了文献学研究与目录学研究走向国际化,使上述两个研究方向在异质文化的翻译与传播方面承担起重要的语际文献整理任务,其中关于传教士汉学文献及其目录的甄别与纠错就是一项重要的工作。

关于新德博士在这部专著中所建树的学术观点及其学术贡献,我想不必赘言,同行学者在仔细阅读这部专著后会给出中肯的评价。实际上,一部学术专著所具有的学术品质还是应该由作者沉淀于其中的文献、思想及学养去给出自己的证明。当然,正如任何学者的任何专著都有着自己的缺憾,这部专著恐怕也不会例外。

2015年8月13日

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光华楼西主楼

1005 办公室

目 录

关于从容探索的学术心境——代序	杨乃乔 1
导 论	1
一、明清时期西方传教士之中国儒道释经典西译概览	1
二、学术史回顾	4
(一) 西方传教士之中国形象研究	5
(二) 西方传教士与中国儒道释宗教关系的研究	8
(三) 西方传教士之中国儒道释经典的翻译研究	13
三、研究方法论	15
(一) 当代翻译研究相关理论	16
(二) 比较文学之形象学理论	20
(三) 文化相遇研究的方法论	24
四、本书结构	26
第一章 从想象到现实:十七世纪前欧洲人对中国宗教文化的诠释	29
一、元时天主教使者及传教士笔下的中国宗教文化形象	30
二、“偶像崇拜者”:马可·波罗笔下的中国宗教文化形象	34
三、大发现时代西方人笔下的中国宗教文化形象	37
第二章 从西僧到西儒:明清之际来华耶稣会士的试错过程	46
一、耶稣会和耶稣会士	47
二、“利玛窦规矩”:文化适应策略	53
三、耶稣会士对中国佛教的诠释	66
(一) 从“西僧”到“西儒”	66
(二) 耶稣会士笔下的佛、法、僧“三宝”	79
(三) 耶稣会士对景教碑中佛教术语的解读	104
四、耶稣会士对道教文化的诠释	106
(一) 利玛窦、曾德昭笔下的中国道教形象	106
(二) 法国耶稣会士笔下的中国道教形象	109
第三章 耶稣会士对儒家经典的翻译与诠释	118
一、耶稣会士对“四书”“五经”的翻译与诠释	118
(一) 耶稣会士对“四书”的翻译	118

(二) 索隐派耶稣会士对儒家经典的翻译与诠释	141
二、中国经典西传与欧洲的启蒙运动	156
(一) 礼仪之争的历史背景	156
(二) 中国宗教文化形象西传与欧洲启蒙运动	159
第四章 从鄙视到接纳:新教传教士之中国宗教文化观	179
一、西方中国形象的转变	180
(一) 马夏尔尼使团访华	180
(二) 不再迷恋中国的欧洲	182
(三) 马夏尔尼等对中国宗教的观察	189
二、早期新教传教士对中国宗教文化的诠释	193
(一) 新教传教士入华	193
(二) 早期新教传教士笔下的中国宗教形象	200
三、晚清新教传教士对中国宗教文化的诠释	217
(一) 汉学之兴起与比较宗教学的发展	217
(二) 保守派与自由派传教政策和方法	224
(三) 晚清新教传教士之中国宗教观	232
第五章 新教传教士之儒家经典的翻译与诠释	235
一、“孔子加耶稣”的再尝试	235
二、早期新教传教士之儒家经典的英译与诠释	241
(一) 马士曼对《论语》的英译与诠释	241
(二) 马礼逊对《三字经》《大学》的英译与诠释	250
(三) 高大卫对“四书”的英译与诠释	255
(四) 麦都思对《尚书》的英译与诠释	262
(五) 早期新教传教士英译中国儒家经典对西方的影响	270
三、理雅各之《诗经》英译与研究	277
(一) 《诗经》西译简史	277
(二) 理雅各《诗经》翻译的缘起	279
(三) 理雅各《诗经》英译体例	282
(四) 理雅各《诗经》翻译的策略及特色	287
四、苏慧廉对《论语》的翻译与诠释	297
(一) 苏慧廉之中国儒教观	298
(二) 苏慧廉《论语》翻译的体例	300
(三) 翻译特色及其评价	308
五、卫礼贤对《易经》的翻译与诠释	320

(一) 来华传教士《易经》西译小史	320
(二) 卫礼贤之中国文化观	323
(三) 卫礼贤之中国经典翻译活动	325
(四) 卫礼贤之《易经》翻译体例与特色	329
(五) 卫礼贤《易经》翻译在西方的影响	340
(六) 今日英语世界的《易经》	344
第六章 “亚洲福音书”:新教传教士对中国佛教经典的翻译与诠释 ..	347
一、佛学研究的肇始	347
(一) 晚清佛教的发展状况	348
(二) 艾约瑟、艾德和毕尔的佛学研究	349
二、基督教入华的准备	360
(一) 佛教和基督教:相异或相同	361
(二) 佛教术语:使用还是废弃	365
(三) 大乘佛教:敌人或是“朋友”	367
三、“亚洲的福音书”	370
(一) 传教士汉语佛教经典的英译	370
(二) 传教士汉语佛教经典英译之评价	374
第七章 新教传教士对道家经典的翻译与诠释	388
一、新教传教士对道家思想的诠释	388
(一) 道家与道教	388
(二) 道教研究的肇始	392
(三) 道教的神仙体系	399
(四) 道教经典的翻译	400
(五) 道教与佛教之间的关系问题	407
(六) “成全”道教:基督教的使命	409
二、理雅各之《道德经》英译研究	411
(一) 翻译缘由与体例	411
(二) 翻译特色与评价	414
第八章 Deus/God 译名之争	423
一、明清之际来华传教士之译名论争	423
二、晚清新教传教士之译名论争	430
三、译名之争对中国典籍西译的影响	441
第九章 问题与思考	444
一、“他者”的镜像:千百年来西方之中国形象的嬗变	444

二、对待“他者”宗教应有的态度	446
三、如何看待明清时期西方传教士的中国经典译本	449
四、中国经典翻译研究与当代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	452
附 录	458
参考文献	467
中西文译名对照表	510
本书所征引的部分经典文本书影	515
后 记	520

导 论

形象学有助于界定和描述一个给定文本中的“异”。

——伊维·谢弗雷尔(Yves Chevreil)

一、明清时期西方传教士之中国儒道释经典西译概览

基督教^①传教士入华的历史,应以聂斯脱利派(Nestorians)(即唐代“景教”)传入中国为开始。后来在元帝国时期,也里可温教盛行一时。之后,基督教在中国沉寂近二百年,于明末清初复兴。无论从纯宗教角度或是从中西交往的角度来看,唐代的景教以及元代的也里可温教都无法与明清之际天主教以及清中后期基督教新教的发展相比。但就基督教入华传播史,学界一般都接受陈垣的分期法:“第一期是唐朝的景教。第二期是元朝的也里可温教。第三期是明朝的天主教。第四期是清朝以后的耶稣教。”^②景教在唐代中国的传播,构成了早期中国基督教史的主要内容。陈垣认为,“要讲基督教入华史,还是要从唐代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讲起。”^③

唐朝时虽有景教在中国传布,但它是经过了叙利亚等西亚国家“转型复合”才经西域传入中国。从现存的史料看,这种“火热的东方教会”^④的来华

① 这里指广义上的基督宗教,包括天主教、东正教和基督教新教,而非狭义上的基督教新教。本书在特指天主教或基督教新教时,将分别用“天主教”“新教”代之。卓新平曾指出:在当前中国语境中,“基督教”一词有两层含义:一为三大教派(天主教、东正教、新教)的总称,二乃专指新教。详见卓新平:《基督教研究》,卓新平主编:《中国宗教学 30 年(1978—2008)》,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年,第 255、293 页。

② 陈垣:《基督教入华史》,《陈垣学术论文集》第 1 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 年,第 93 页。

③ 同上。

④ John Stewart, *Nestorian Missionary Enterprise: The Story of a Church on Fire*, Edinburgh: T. & T. Clark, 1928.

传教士来自西亚,并没有史料能证明欧洲人与景教来华有什么瓜葛。到了元帝国时期,欧洲国家的商人、教廷使者以及天主教传教士陆续来华,他们西方基督教的背景、欧洲传教士的身份,才在他们观察中国所留下来的各种文本中逐渐彰显出来。

从元帝国时期到晚清、民国,西方来华传教士体认中国文化已有近千年的历史。正如陈义海所概述的那样,这些来华传教士有着多重身份:他们首先是宗教传播者,是“上帝的使者”;其次,他们又是西方殖民者的先遣队,在武力扩张或殖民侵略之前先作文化上的征服;第三,他们还是东西方两大文明之间的“摆渡者”^①。尤其是传教士的最后一种身份,明清时期西方来华传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双向影响一直延续到今日。不管是“西学东渐”,抑或是“中学西传”,作为“摆渡者”的传教士在中西文化双向交流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单就“中学西传”而言,这些来自西方的天主教传教士和新教传教士,他们在华居住数年、十几年或几十年,甚至终老于中土,他们或通过书信、报告,或通过游记作品、汉学著作,以不同的书写方式和多重渠道向西方世界言说着中国,他们是数个世纪以来西方之中国形象的最重要的塑造者。这些传教士留下的文本不仅为中西文学创作提供了大量的素材,而且从广义上说,它们本身也是西方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成为西方普罗大众认知中国的重要知识来源。数百年来,这些传教士们报道中国历经从物质文化到制度文明、再到精神观念的转变,然而他们最感兴趣的,往往还是迥异于他们基督教文化传统的“他者”中国儒道释宗教文化^②形象。在元帝国时期,来自欧洲国家的商人、教廷使者以及天主教传教士开始注意到中国的汉传佛教以及民间宗教敬拜,但对中国本土的道教、儒家思想几乎一无所知;在地理大发现时期,越来越多的西方商人、旅行家、天主教修会的传教士来到中国,虽然他们仍是走马观花似地观察中国,但他们在游记或书信报告中首次提到了中国的道教以及文人的宗教——儒家思想。经历了从“西僧”到“西儒”试错过程的晚明来华的耶稣会士,尽管他们对佛教、道教、道家思想都有过接触,可最终他们还是倒向他们所称的“儒教”。他们着手研究和翻译中国儒家经典,先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经典,然后是《诗经》《尚书》《易经》等五经典籍。晚清的新教传教士之中国经典的翻译,也有

^① 陈义海:《明清之际:异质文化交流的一种范式》,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118页。

^② 这里的“儒道释宗教”泛指中国儒家思想、道家思想、道教以及佛教。尽管学界对儒家思想是否具有宗教性尚有争论,笔者还是将它与道家、道教以及佛教并列在一起。至于道家、道教的关系问题,中国现当代学者许地山、任继愈等均有论述。详见许地山:《道家思想与道教》,《道教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41—176页;任继愈的观点,详见下文第七章第一节引文。

类似的经历：从马士曼、马礼逊、高大卫分别英译《论语》《大学》和“四书”经典，到理雅各（James Legge）英译包括“四书”“五经”在内的儒家经典以及佛教典籍和道家经典。虽说早在元帝国时期，西方旅行家、教廷使者、天主教传教士已经注意到了中国的佛教与道教，晚明时期的耶稣会士也对佛教、道教的思想进行了批判，但一直到晚清时期，方有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开始认真研究中国道教与佛教，并向西方传译中国道教与佛教经典。

这些来华的西方传教士，是中国典籍西译的最初和最主要的译者，明清之际，以耶稣会士为代表，晚清时期，则以来自英国的新教传教士最为活跃。明清之际的耶稣会士，他们侧重于翻译介绍中国儒家经典，开启欧洲的早期汉学研究；晚清时期的新教传教士，尤其是以来自英国的伦敦会传教士为代表，他们从最初翻译介绍儒家经典，逐步延伸到对中国佛教、道教的研究与经典传译方面，这样到了清末民初，以传教士为译者主体的中国典籍西译工作几近完成。这里所说的中国典籍，是指最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主体的儒道释经典。基于目前能够收集到的资料及海内外学界的研究，我们已经知道，在明清之际，先后有多位耶稣会士或合作、或独自翻译了“四书”“五经”的片断或全文；而在晚清时期，也先后有数位来华的新教传教士翻译了儒道释的多种经典。从最初耶稣会士利玛窦、罗明坚把“四书”译成拉丁文，到后来的新教传教士理雅各对“四书”“五经”、《道德经》的英译以及李提摩太、苏慧廉等对中国佛教经典的研究与翻译等，他们对中国儒道释宗教文化的研究与汉语经典的翻译，或是为了区别基督教的“自我”与中国宗教文化的“他者”，以彰显二者之异；或是从佛教等流传中国千百年的历程中汲取有益的启示，认为儒、道、释在不同的层面为基督教入华预备了道，以寻求二者之同。在明清时期，西方传教士以“他者”眼光所构建的中国儒道释的宗教形象，是有着差异性的，所以他们在传译中国儒道释经典时所采取的策略也是各异的。西方传教士翻译中国儒道释经典，译什么，怎么译，都是经过精心选择的。晚清来华的传教士，尤其是英国新教传教士，除对儒家经典进行翻译研究之外，他们还翻译了大量佛教、道家、道教以及民间宗教的汉语典籍，并对其进行了很深入的研究。总之，明清时期西方传教士或“以耶释儒”，或“以耶释佛”“以耶释道”，他们对中国儒道释典籍之翻译与诠释，不仅与他们所塑造的“他者”中国宗教形象有关，也与他们的传教策略、翻译策略密不可分。尽管这些传教士最初翻译动因是为了宣教，但是，在客观上他们的翻译行动促进了中国文化的西传以及西方汉学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在中西宗教文化的双向对话与交流方面，他们不愧为远见卓识的先驱学人。

在《真理与方法》一书中，伽达默尔指出：“一切翻译就已经是解释，我们甚至可以说，翻译始终是解释的过程，是翻译者对先给予他的语词所进行的解释过程。”^①同时，他又认为，“翻译者必须克服语言之间的鸿沟，这一例证使得在解释者和文本之间起作用的并与谈话中的相互了解相一致的相互关系显得特别明显，因为所有翻译者都是解释者。”^②对于中国宗教经典的翻译者主体——明清时期来华的西方传教士来说，他们又都是中国宗教文化的诠释者，这也就是笔者在本书标题中将“翻译”与“诠释”并置的原因。

当年不少耶稣会士与新教传教士对中国经典学习与研究以及在翻译中国经典上所花费的时间与精力，确实是今日不少汉学家无法企及的。今天我们研究当年身为传教士译者的翻译策略以及他们对中国儒道释文化之“他者”形象，一方面可以帮助我们汲取历史经验与教训，重新认识当年传教士中国经典译本的历史价值，尤其是这些译本在西方世界所产生的影响以及西方读者的接受方式，进一步探讨来华传教士在中西跨文化交流的意义、中西宗教交流的现实意义；另一方面也是为促进今日之中国典籍西译、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提供可资参照的历史经验，并为今日世界翻译的理论建构以及中国译学的理论建设提供大量范例，丰富比较文学之跨学科、跨国界、跨语言研究的内涵，进而指导我们中国学者进行典籍西译工作，推动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建设。

二、学术史回顾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国内掀起一股基督教研究热，但许多课题研究“比较集中”，“比较泛泛，缺乏一定的深度和广度”，“对于西学东渐介绍多，对于东学西渐的介绍则几乎付之阙如”^③。在《另一种形象——从世界汉学看传教士在沟通中西文化上的作用》一文中谈到传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上的作用时，卓新平也指出：从总体上看，中国内地更多关注基督教“传入”中国这一动向，人们在拒斥其“传来”的内容时，却往往忘记或忽略了传教士从中国“传出”的东西及其意义，使之湮没在历史的迷茫之中。“迄今中

① [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洪汉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518页。

② 同上书，第522—523页。

③ 郭熹微：《中国基督教史研究》，《中国宗教研究年鉴1996》，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84—302页。

国学术界系统论述传教士‘中学西传’的专著仍凤毛麟角，人们在触及其积极意义时亦会有谈虎色变之顾忌。”^①而同样在最近20多年里，国外的相关研究也发生了重大范式的转换，过去是从传教学和欧洲中心论的范式出发，现在转到了汉学和中国中心论的范式。^②学界有关基督教与中国社会文化关系的研究日趋多元化，海内外学者分别从跨学科、跨档案、跨视角等层面进行了不同的研究。

然而，如何将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与传教士的汉学研究结合起来，仍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以往的研究多将传教士的西方语言著作及影响和传教士在华活动及影响分开，从而使很多人忽视了传教士们的汉学研究。从中国基督教史研究来看，对传教士西方语言汉学著作的研究恰恰是我们学术研究上的不足。事实上，任何一位汉学家，他从事汉学研究的基本条件就是要阅读中国文化的典籍，无论是中文原典或是翻译文本。国内学者张西平指出：“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搞清中文文献在西方的流传史，这直接影响我们对西方汉学史的研究。”^③西方汉学家获得的有关中国经典的翻译文本各不相同，这些不同的中国典籍文本决定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而这不同的翻译文本在过去若干个世纪影响了中国在西方的文化形象与国际定位。传教士汉学是近年来学界研究的热点，其史的梳理方面已经有成果问世，而以文本为中心的个案研究尚不多见。在很大程度上，国内外学者忽略了当年传教士之中国儒道释经典西文翻译文本，对传教士的评价也往往受到过多外在因素的影响。

（一）西方传教士之中国形象研究

本书虽是研究西方传教士对中国儒道释经典的翻译与诠释，但如其大标题所示，它不仅涉及狭义上的传教士之中国儒道释经典文本翻译之研究，而且涉及更为宽泛意义上的翻译研究，西方传教士之中国形象、中国儒道释等宗教形象的研究以及他们传译中国经典时的翻译策略。本书是在西方之中国形象、中国宗教文化形象大背景下，对西方传教士之中国儒道释经典翻译的研究。

① 卓新平：《另一种形象——从世界汉学看传教士在沟通中西文化上的作用》，载《国际汉学》第十九辑，郑州：大象出版社，2010年，第172页。

② 早在1999年，研究中国基督教的比利时学者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就曾撰文指出：最近25年基督教在华传播史的研究发生了重要的范式变换，过去是从传教学和欧洲中心论的范式出发，现在转到了汉学和中国中心论的范式。参见〔比利时〕钟鸣旦：《基督教在华传播史研究的新趋势》，《基督教文化学刊》第二辑，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9年，第243—285页。

③ 郝平、张西平：《树立文化自觉，推进国际汉学研究》（国际汉学研究丛书总序），《法国汉学家论中国文学——古典诗词》，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年，第3页。